

誰的悲情誰的歌？ 從影像反思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記憶政治

主辦單位：台灣社會研究季刊、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

合辦單位：新新聞

活動地點：台北市徐州路 21 號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

活動時間：第一場 2005/2/26 週六下午一點起

第二場 2005/2/27 週日下午一點起

## 順應強權，解殖正義缺席，誤認加害者

吳介民

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

### I.

扁宋會，在二二八紀念日的前夕喧騰一時。藍綠兩個陣營的傳統支持者，都有不滿的聲音，尤其是長期以來推動台灣獨立者的憤怒程度，更是令人驚愕。我昨天收到的一封電子郵件，有這樣幾段文字：

我們對阿扁的背信與賣國行為深感憤怒、也為故鄉台灣深感悲哀。

從浮士德的與魔鬼交換靈魂

到抓鬼反被鬼抓

回到2004.3.19 那一槍 那一天 應該要成為他的忌日的!!

現在終於體會到 對一個歷史罪人而言 "人人得以誅之" 的真諦何在

從來沒有看過比這樣更加憤怒的語言，來指責陳水扁了。對於特定政黨的長期支持者而言，政治菁英們的利益交換，是多麼令人難以忍受。

宋楚瑜接受報社訪問時，得意而且露骨地說：「如果沒有美國，你認為陳水扁會與我會談嗎？」

這樣看來，扁宋會談背後的真正驅動力，是在美國了。這兩個原本在國家定位、國族認同差異何其大的陣營，竟然都是在爭取美國的背書。

過去幾年，我們觀察到，當台灣意圖在國際或國內採取自主行動，而面臨美國的壓力時，民進黨政府便做出政策宣示上的急轉彎。這種機會主義式的政治權宜，不過一再反映了美國對台灣的霸權支配地位。

政客的和解，本質上是利益的交換、妥協，這對於社會的和解，往往沒有正面的助益，甚至可能帶來負面的撕裂效果。

### II.

那麼，值得人們追尋的和解，要從哪裡開始呢？

最近幾年，由於學術文化界的努力，個體主義式的生命傳記的追尋，成為尋求社會和解的一個重要途徑。這個取向，著重在個體生命處在外在壓迫情境下的細微的關照，強調個人之間觀點的交換、透過互相凝視對方的苦難，而願意放棄自我中心的悲情觀念。<sup>1</sup> 我無意貶低這個努力的貢獻和必要性，但是想指出，如果僅僅採取這個途徑，並無法解決我們今天面對的難題。

我們需要從歷史制度的面向徹底追問。

台灣從 1945 年之後，國民黨所建構的國家機器的性質 — 內建於美國帝國勢力範圍內的**類殖民體制** (quasi-colonial regime) — 在思想上一直沒有得到徹底的批判清理。因此，這個體制的遺緒，也就隨著兩蔣王朝遺傳下來，歷經李登輝時代所謂的「寧靜革命」而一直延續到目前的民進黨政府。換言之，民主化的過程，沒有同時解除這個類殖民體制的弊害，連帶使得轉型正義 (transitional justice) 也得不到妥善的處理。<sup>2</sup> 因此，今天轉型正義不能伸張，背後還有更深遠的因素，在這裡可以稱作**解殖正義**的難題。

如同吳乃德教授（以及其他研究者）指出的，白色恐怖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監控的體制，<sup>3</sup> 它除了對於身體的、物質性質的宰制，還配合著一套合理化這個社會監控制度的意識形態。這裡的意識形態，不只是通常所說黨國體制意識形態、三民主義的教條等等（事實上，這些是屬於淺層的麻醉，而不是深層的洗腦）。我想指出的，是人們對應於強權政治 — 強權政治教化的價值觀、行為模式 — 所採取的柔順、附和的、甚至是轉化為媚俗的生活態度 (habitus)。我想把這個整體現象統稱為：**國家恐怖主義**。

從這個觀點來看冷戰時代，這個類殖民恐怖政治，帶給台灣一種長期的社會文化效應：反共、保守、依附權勢的集體心態。台灣社會長期對美國文化霸權近乎無意識的順從；加上威權統治，使人們更難以在日常生活中對此體制產生批判的態度。二二八、白色恐怖，對社會的深遠影響，陳映真在 1980 年代的小說中有深入的描繪。因國民黨移入而受害的一代，心中充滿怨懟，但無法公開表露和抵抗，只能在苟且委屈中求生存，而將希望寄託在下一代，但是這種寄託的內在精神，並不是鼓勵他們獻身社會改革，而是一種結合內心哀怨、對權力者委屈逢迎、以及自身求上進的「生存之道」。「避開政治、用功讀書、努力工作」成了主宰台灣社會的精神狀態。我們在〈山路〉和〈夜行貨車〉等小說中都不斷看到這種精神的複製。〈山路〉中，蔡千惠這位仰慕革命青年和左派理想而自我犧牲的偉大女性，佯稱是白色恐怖受難者李國坤的妻子，到李家尋求救贖，非但沒有將恐怖真相告訴他的小叔國木，竟

<sup>1</sup> 參見張茂桂，〈心中之石與「族群和解」的問題〉。

<sup>2</sup> 對轉型正義的討論，參見吳乃德最近的論文 (Wu, 2004)。

<sup>3</sup> 吳乃德，〈回首來時路：威權遺產或民主資產？〉2005.02.21 總統府演講。

也（不得不）以上述方式培育國木。在〈夜行貨車〉中，主角詹奕宏那因為改朝換代而失意的父親，也是如此教育兒女。

《悲情城市》影片當中，幾場吃飯的戲，尤其是家族遭逢災難之後的聚會與吃喝，相當精確表達了逆來順受的生命態度。還有，二二八事件發生後，軍隊鎮壓，吳寬榮受傷逃回鄉下老家，他的父親見面就先賞他一巴掌，要他躲起來。寬榮的父親，和詹奕宏的父親，幾乎是同一個版模灌漿、打造出來的。

這幾場戲，似乎預示了從 1950 年開始的社會集體心態的基調。我不確定的是，這的確是當時的社會真實？或是導演和編劇，以當代的眼光去回溯、建構出來的圖像？類似的歷史詮釋，也出現在事件當時本省人追打外省人的場景，我們在影片中看到那些蓄著長髮，手持木棍刀械「不良青年」模樣的人，彷彿置身 1970 年代，我們在三重夜市吃宵夜時經常目睹的場景。

### III.

不論如何，我想強調的是，國家恐怖主義的制度與行徑 — 雖然這個歷史僅僅在二十年前還是活生生的日常真實 — 這個歷史沒有得到適當的清理（更不用說是徹底的清理），是造成台灣今天族群政治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
這些年來，族群政治一直成為政黨競爭的工具。於是，很多人呼籲，不要將族群問題政治化。但是，真正的問題是，族群關係內在必然蘊涵著政治性，這是不能迴避的現實。

台灣面對未來與中國大陸的統獨選擇，原本應該可以和族群權力的紛擾區隔開來的。之所以造成難題，主要是因為台灣脫離日本殖民之後，解殖正義非但未能實現，而且在冷戰的結構下被凍結起來。民眾素樸的認同情感（接近 Eric Hobsbawm 所說的 *primordial nationalism*）得不到抒發，只能在被壓抑的情感狀態下，在族群間權力分配不均的現象（或者虛假的表象）當中，去「指認」、「歸因」壓迫的根源。<sup>4</sup> 假如說，威權時代最主要的政治矛盾，不是「外省人欺壓本省人」這個被「誤認的命題」（*misrecognized statement*），而是類殖民體制所衍生之國家對社會的統治關係，那麼，2000 年政黨輪替之後權力重組產生的衝突，也不應該被誤認為「本省人反過來欺壓外省人」，而是因為類殖民體制的負面遺產，沒有得到歷史性的清理、轉型正義沒有實現所致。

換句話說，人們在不同的歷史階段，都重演了「誤認加害者」的戲碼。

---

<sup>4</sup> 必須指出，本省籍民眾認同台灣的素樸情感，並非（單單）起源於二二八事件或冷戰時代，早在日據時代的文學作品中即見端倪。吳濁流「亞細亞孤兒」的喟嘆，鍾理和筆下在大陸的「白薯的命運」，都表明了日據時代台灣人嘗試從「祖國」尋求生活機會或情感慰藉時所遭逢的深刻挫折感。

關於二二八、白色恐怖，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這段歷史，即使是片段也罷？或者更可能的情況是，人們不敢直接面對充滿創傷的歷史，但是壓抑在心中的憤怒與聲音，卻必須找到抒發的窗口。就是在這樣的社會心理背景之下，族群政治，以及跟這個東西對抗的、姑且稱之為「反族群政治」的現象，才使人們產生了誤認的作用。

於是，人們憤怒的對象便慢慢轉化成、而且膠著在省籍族群這個對象上面。族群，既然被誤認為是恐怖政治的源頭；何況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，都是這個恐怖主義的受害者，那麼，似乎每個人都是族群政治的犧牲者了。因此，時下最常見、似乎也是最為政治正確的精神解脫的方法，就是不分族群背景，從自己的生命傳記經驗去訴說、交換自己被恐怖政治壓迫的經驗。

這樣的處理方式，會不會變成一種媚俗化的傅柯主義式的歷史觀點：如同權力作用是無孔不入的、自我再生產的循環，既沒有主體、也沒有客體，那麼恐怖政治是否也跟著找不到任何一個加害者（恐怖的主體）呢？

族群的惱怒，以及內化的恐懼，是不是可能加以轉換、解消？這個問題，恐怕不是完全依賴個體主義式的告解與救贖可以處理的。

我們如果不願意從歷史一體制的尺度，去衡量人的痛苦創傷，那麼歷史的悲劇就永遠可能重演。

我們有沒有可能從社會的觀點，而不是隨著政治菁英起舞，來反省在帝國霸權的箝制之下，國家恐怖主義對於社會的宰制、文化的扼殺、歷史的抹除？顯然，這幾年來困擾著台灣的黨派路線鬥爭，是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的。

最後，我想引述一位華裔旅美作家，王超華，對於藍綠權力鬥爭的看法：「『愛臺灣』却不能貫徹始終地『反強權』——無論是美國的強權還是中國的強權——正在有效地掩蓋著臺灣政治中最根本的內在矛盾。」<sup>5</sup>

那麼，這個矛盾是什麼呢？

從過去到現在，從政治到社會領域，整個社會籠罩著順應強權的集體心態，因此導致解殖正義的缺席，進而造成人們誤認了加害者，難以看清楚國家恐怖主義這個幽靈依然在糾纏著我們。我大膽地猜想，這才是台灣政治中一個根本的內在矛盾。

---

<sup>5</sup> 王超華 (2004: 269)。